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

## ——基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视角

张为付, 吴怡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使命, 外交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和扩展。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对 OFDI 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运用 2010—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 考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对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得到以下结论: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这种促进作用得到加强。因此, 企业可以加强对国家之间外交形势的关注, 与时俱进, 借助政策的东风, 主动参与国际市场, 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

**关键词:**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21)01-0088-10

### 一、引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模式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国有企业占比下降, 但占比依然大, 根据《2018 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虽然国有企业占比从 2006 年的 81% 下降至 2018 年的 48%, 但是 2018 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排名前十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 二是主要流向传统投资领域, 投资额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制造业, 分别占 35.5%、15.2% 和 13.4%; 三是主要的区位选择是中国香港、东盟和欧盟, 2018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分别为 60.7%、9.6% 和 6.2%, 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美国只有 3.8%; 四是具有较强的政治偏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领域广泛, 流向制造、电力生产投资的增幅较大, 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俄罗斯联邦、泰国、孟加拉国等国家。目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优势来源于国家层面的自然优势、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sup>[1]</sup>。周朝鸿和张建红<sup>[2]</sup>认为在国际直接投资中, 母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可以为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机会并给予合理保障。

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途径。例如 2015 年, 习近平总书记同普京总统五次会晤, 将双边外交关系和政治互信提升到新的高度, 达成中俄“三个不变”的重要共识, 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么变, 双方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变, 致力于实现两国共

收稿日期: 2020-04-29; 修回日期: 2020-11-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TPP 外部约束下我国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战略研究”(16JZD019);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FDI 区位选择”(KYCX19\_1376)

作者简介: 张为付(1963—), 男, 江苏徐州人, 经济学博士,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和全球价值链; 吴怡(1996—), 女, 江苏盐城人,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

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会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不会变,共同引领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在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期间签署 30 余项能源合作文件,许多重大战略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 年 5 月,普京总统应邀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表示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中俄友好的外交关系可以赋予双边经济交易与投资一种优先权。国家之间通过外交关系开展商务活动,直接推动国家资本的流动。因此,本文基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到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影响;第二,在实证方法上,运用面板分位回归,分析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 OFDI 在不同分位点下的影响;第三,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背景;第四部分是模型与数据;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应该是一个经济活动,但这一经济活动不可能单独存在,它的发展还受到其他诸如政治<sup>[3]</sup>和制度<sup>[4]</sup>等因素的影响。制度是一种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塑造互动关系的规则。从引力模型深入,将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冰山成本,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sup>[5]</sup>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国家之间达成友好互惠的合作。张建红和姜建刚<sup>[6]</sup>运用中国对 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蒋冠宏<sup>[7]</sup>认为制度差异、文化距离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由于制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可以从制度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还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政治行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杨连星等<sup>[8]</sup>运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角度研究,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以上学者从政治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促进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受其余因素的制约,如税收规避、资源获取、市场寻求、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王永钦等<sup>[9]</sup>以中国 2002—2011 年间的 842 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 OFDI 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蒋冠宏和蒋殿春<sup>[10]</sup>基于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 OFDI 的区位选择,中国 OFDI 有市场寻求动机。Kong *et al.*<sup>[11]</sup>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探究母国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Papageorgiadis *et al.*<sup>[12]</sup>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

友好外交关系的建立表明两个国家之间明确了积极主动、相互合作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双边友好的外交关系可使双边经济活动融入独特的制度之中,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更长时期受双方外交关系的影响。企业基于理性的选择,更倾向于对与本国外交关系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双方领导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如签订双边协议与条约、在东道国设置专门的国际政府组织与机构、完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等。宗芳宇等<sup>[13]</sup>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进行投资。张亚斌<sup>[14]</sup>构建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投资便利化的提升可以降低双边交易成本。

## 三、研究假设

综合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本文在构建的分析模型中重点研究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并且考虑引力变量、建交时间、共同语言和共同边际。

### (一) 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可以体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积极发展与各国的经济合作。宏观层面上,国家之间双边外交关系让经济活动范围得以扩大,两国政府之间也可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合作者<sup>[15]</sup>。微观层面上,一方面,国家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通过友好协商或者政治压力,为母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提供一系列的投资合约和协议,降低跨国企业的谈判费用和交易成本,因此,两

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可以为投资商在东道国获取商业优势; 另一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同样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sup>[16]</sup>与风险最小化<sup>[17]</sup>, 风险最小化的意识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会考虑到两个国家外交关系。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而言,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发送和传递了一种激励信号, 这种信号可以增加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因此, 政府的外交偏好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当中国偏好于某一国家, 友好外交活动增加, 这也是给中国企业释放了一种鼓励信号, 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友好外交关系能够促使中国到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 (二) 建交时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可能会受到建交时间的影响。建交时间表明两个不同主权国家正式确定了双边友好外交关系, 是一种存在于两国之间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国家之间长久的历史关系可能会对双边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 两国经济活动溯源越久, 越有可能促进两国投资活动所需要的制度与规则的完善, 也越有助于投资者对东道国制度与规则的适应, 从而缩小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或文化距离, 降低信息沟通成本, 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外交的时间越长, 越有利于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三) “一带一路”倡议

政府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潜在角色, 并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颇具特色的一面<sup>[18]</sup>。政治为经济服务, 双边外交关系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与中国有相同的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少、外交关系定位好的东道国<sup>[19]</sup>。本文选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为研究背景。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日益增加。截至 2018 年末,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 727.7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8.7%。2018 年末,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位列前十的国家是: 新加坡、俄罗斯联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泰国、越南。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sup>[20]</sup>。

2013 年至 2018 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 986.2 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 10 000 家, 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位列第一。本文试图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区位选择是否会受到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后,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进一步促进中国对 OFDI 区位选择。

## 四、模型与数据

### (一)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 1. 计量模型

为实现研究目的, 结合文献综述,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OFDI_{it} = \alpha \cdot visit_{it} + \beta \cdot his_{it} + \gamma \cdot gdp_{it} + \delta \cdot gdpf_{it} + \theta \cdot dis_{it} + \varphi \cdot bund_{it} + \sigma \cdot la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t$  分别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年份。OFDI 表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visit$  表示双边友好外交新闻报道的次数,  $his$  代表外交时间,  $gdp$  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gdpf$  为东道国市场规模,  $dis$  为两国之间的距离,  $bund$  和  $lan$  是哑变量,  $\varepsilon$  为残差项。

#### 2. 估计方法

借鉴杨娇辉等<sup>[21]</sup>的做法, 本文选择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回归,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与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相比, 面板

分位数回归模型放松了假设条件,更充分考虑了极端值,估计更具有稳健性,且适合存在异方差的模型。结合面板分位数模型的特征,本文研究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在区位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并非服从正太分布。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不但可以体现不同分位点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化特点,而且可以改善非正太分布的数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放的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没有严格划分。本文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限定为 63 个。在剔除数据缺失的克罗地亚、叙利亚、伊拉克和摩尔多瓦 4 个国家之后,本文最后得到 59 个样本国家。研究时间段为 2010—2018 年。

### 1. 对外直接投资(OFDI)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一直都是正数,存在不少投资流量为负数或零的情况,因此不能直接取对数。现有部分文献直接将这些样本剔除,但这种处理方法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性和无效性,也人为地忽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sup>[22]</sup>。本文没有将这部分数据剔除,一方面可以避免样本量缩小;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结果带有主观性。

### 2.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visit)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外交关系是国家之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主动性选择与安排。本文的研究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 59 个国家,搜集了 2010—2018 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新闻报道,借鉴余泳泽和潘妍<sup>[23]</sup>的研究,将“在致力于实现两国共同发展”“高层之间交往密切(如出访、接访、工作会晤、慰问)”“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丰硕的成果”“达成重要的共识”等词语的出现作为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体现。如果相关新闻报道中出现上述词,我们将之作为一次双边友好互动,本文将上述新闻报道进行累计,用来衡量两国外交友好的程度,两国外交往来越频繁,二者外交关系越密切。具体信息来源于外交部网站——外交动态。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只统计了外交报道中的国家元首(主席、总统、国王)和政府首脑(总理)级别参与的外交活动,未将其他党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外交活动计入在内,因为国家主席和总理是国家和政府的象征,负责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事项,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而其他党和政府官员常常只负责一个部门的事务,其外交活动往往是为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外交活动做铺垫或者进一步交流具体事项。相比而言,国家元首和首脑的访问更为重要,对双边外交关系的推动也更有意义。第二,本文只对双边外交活动进行了分析,不包括国际多边活动中的集体会晤,多边交流往往讨论的是某一国际问题。双边外交活动限定在正式的国事访问,不考虑过境访问、私人访问等非工作性质的活动。

### 3. 建交时间(his)

建交时间为代表中国与东道国外交持续的时间(以年为单位)。借鉴杨连星等<sup>[8]</sup>的研究,本文以 2018 年与初始的建交年份的差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外交部网站——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

### 4. 引力变量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投资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利用物理上的引力模型研究两国贸易的因素,即两国贸易流量与两国 GDP 正相关,而与距离负相关。程惠芳和阮翔<sup>[24]</sup>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中。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也将引力模型纳入模型之中。

(1) 东道国市场份额(*gdpf*)与中国市场规模(*gdpc*)。东道国市场份额(*gdpf*)用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上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数据库。中国市场规模(*gdpc*)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地理距离(*dis*)。中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指数主要来自 CEPII 数据库, 本文选取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测度, 代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冰山成本。地理距离越大, 跨国直接投资的运营成本越大, 不确定性因素也越多, 对外直接投资会因此而减少。

### 5. 文化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不仅关注地理上的距离, 还关注文化上的距离。母国与东道国有共同语言时, 往往表明两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类似的文化价值观, 信息沟通的成本减少, 更容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母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有共同边界或者接壤时, 两国的经济往来、投资沟通往往更加便捷。与李阳等<sup>[25]</sup>的研究一致, 本文也考虑到了文化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母国与东道国是否有共同边界(*bund*)。若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 *bund* 取值为 1, 否则为 0。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当两国具有共同边界时, 更有机会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等事实表明, 有共同边界的国家通常先展开区域一体化, 然后不断扩散到周围国家和地区。

(2) 母国与东道国是否有相同语言(*lan*)。若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语言, *lan* 取值为 1, 否则为 0。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Wang and Larimo<sup>[26]</sup>从文化距离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若东道国与中国存在共同语言, 可以显示出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小。

###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性质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OFDI</i>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531	2.574 491	7.632 374	-25.102 7	104.524 8
	<i>visit</i>	双边友好外交活动次数	531	11.589 45	14.973 85	0	152
	<i>his</i>	建交时间	531	43.491 53	18.203 91	12	69
解释变量	<i>gdpc</i>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531	10.009 44	2.207 465	6.087	13.608
	<i>gdpc</i>	东道国市场规模	531	2.124 298	3.893 711	0.024 87	27.19
	<i>dis</i>	地理距离	531	6.803 684	8.016 287	1.172 047	65.233 57
	<i>bund</i>	共同边界	531	0.201 507	0.401 504	0	1
	<i>lan</i>	共同语言	531	0.033 898	0.181 138	0	1

##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模型回归估计

本文选择 10%、25%、50%、75%、90% 这五个分位点, 分别代表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的 OFDI 流量水平,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本文关注的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 50% 和 75% 的两个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 即在东道国市场规模、建交时间、距离、边界和语言相同的情况下, 中等及较高层次的中国 OFDI 的区位分布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呈正相关, 存在着“国家推动”的特征。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低分位点和很高的分位点不显著。假设 1 基本上成立, 下文会再证明。一方面, 为巩固与各国之间的合作, 国家通过各种国际行为, 直接推动中国对外的投资; 另一方面,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本着共同发展的目标, 建立起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能把各种资源有效地组合起来, 并进行合理分配, 赋予企业一种新的所有权优势, 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面临两种政治风险<sup>[27]</sup>: 东道国的自身风险、中国与东道国政体不同所形成的风险。意识形态的风险源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外交风险。东道国政府往往把在境内的母国投资商与母国政府联系在一起, 母国投资商与母国政府动机相同; 同时, 对外直接投资不是一项短期投资, 一般周期较长, 付出了沉没成本, 如果选择在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从东道国撤资的损失较大。因此, 东道国政府与民众易把两国之间双边外交关系的恶化转移给在其领域内进行投资的母国企业。张为付和李逢春<sup>[28]</sup>的研究发现, OFDI 会受到情感

的影响,任何 OFDI 行为都是有限信息下的一种选择。

建交时间在 90% 的分位点显著为正,在 25%、50% 的分位点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还不能证明假设 2,即建交时间对 OFDI 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相关或负向相关。张建红和姜建刚<sup>[6]</sup>研究发现,建交时间与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本文得出的结论与之不同。一般而言,两国建交时间越久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额越多。但本文认为,两国之间建交时间长并不能代表两国外交关系一直是友好的状态,也可能存在外交关系中断或者外交关系恶化。两国正式建交之后,外交关系不会一成不变。例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 1950 年建交,印度尼西亚发生“9·30 事件”后,两国于 1967 年中断外交关系。因此,假设 2 不成立。

程惠芳和阮翔<sup>[24]</sup>研究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与投资国和东道国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与引力模型得出的观点不一致,我国的 GDP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完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这与谢杰和刘任余<sup>[29]</sup>的观点一致。与引力模型得到的结论一致,东道国的 GDP 越大,我国对该国的投资就越多,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对我国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当两国之间存在共同边界,两国之间更容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使用中国语言,中国也更倾向于去该国进行直接投资。

## (二) 引入交叉项模型回归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寻求市场,东道国的市场份额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经济因素。在寻求东道国市场时,东道国政府可能会限制进入,跨国公司因而面临困难。双边领导人的互动,增加了协商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母国与东道国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对话有利于信息与知识的传递,减少不确定性。双边友好外交关系能否弥补东道国市场份额不足? 本文为了研究东道国的市场份额对 OFDI 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影响,加入东道国市场份额与双边友好关系的交互项,使用面板分位数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3。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中等至很高的分位点都显著正相关,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我国 OFDI 的回归系数由 0.031 8 增至 0.134 6。由此可见,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促进中国 OFDI 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对高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 1 成立。

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交互项在低分位点显著正向相关,在高分位点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在较低规模的 OFDI 的区位选择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 OFDI 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正向的影响。通常,母国更愿意把资源转移到与其政治意识和政治形态矛盾更低的国家。在中等规模的 OFDI 的区位选择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 OFDI 的作用不受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在高水平的 OFDI 的区位选择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 OFDI 的作用,受到双边友好外交关系

表 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不同分位点结果

变量	10%	25%	50%	75%	90%
<i>visit</i>	-0.008 9 (-0.51)	0.008 6 (0.92)	0.031 8* (1.68)	0.076 4*** (3.27)	0.052 7 (1.10)
<i>his</i>	-0.002 7 (-1.34)	-0.005 5*** (-2.99)	-0.005 5* (-1.84)	0.001 9 (0.43)	0.056 6** (1.96)
<i>gdp<sub>c</sub></i>	-0.009 9 (-0.56)	0.004 4 (0.44)	0.001 1 (0.08)	0.030 2 (1.15)	0.063 (0.89)
<i>gdp<sub>f</sub></i>	0.078 6 (1.51)	0.254 3*** (4.59)	0.454 7*** (3.97)	0.538 9*** (4.28)	1.150 9*** (3.90)
<i>dis</i>	0.000 7 (0.61)	0.000 4 (0.21)	-0.001 3 (-0.84)	-0.006 9*** (-2.79)	-0.017 5*** (-3.1)
<i>bund</i>	0.244 1 (1.25)	0.656 1*** (3.06)	1.643 4*** (3.5)	2.148 1*** (3.40)	4.879 1*** (2.89)
<i>lan</i>	0.132 1 (1.06)	0.003 3 (0.00)	9.718 6 (1.18)	29.235 7** (1.87)	57.750 8*** (2.55)
<i>cons</i>	0.115 1 (0.83)	-0.035 9 (-0.32)	-0.044 2 (-0.24)	-0.354 3 (-1.18)	-1.455 7 (-1.53)
R <sup>2</sup>	0.008 3	0.051 6	0.172 7	0.360 5	0.477 5
N	531	531	531	531	53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的负向冲击。本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可以弥补东道国市场份额不足。但是,一国长期、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还是要通过市场去判断能否成功、是否可以持续。

建交历史在此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进一步证明假设 2 不成立,也证实了之前的解释。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回归结果也不显著,与上文解释一样。其余的引力变量与相关变量得出的结论也与上一个回归中的结果一致。

### (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对比

为了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针对 2010—2013 年和 2013—2018 年间的样本进行考察。分位点分为 3 个: 25%、50% 和 75%, 具体结果见表 4。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增强了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我国 OFDI 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 OFDI 的影响基本上不显著。倡议实施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中等至很高的分位点是显著为正的,并且得到加强。本文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流、经济对话、磋商与合作增多,有利于信息与知识的传递,减少不确定性。这种信息的透明化可以减少我国企业对外直

表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区位选择: 引入交互项

变量	10%	25%	50%	75%	90%
<i>visit</i>	-0.015 7 (-0.69)	-0.001 1 (-0.22)	0.031 8** (1.94)	0.100 5*** (4.46)	0.134 6** (2.49)
<i>his</i>	-0.000 5 (-0.34)	-0.001 4 (-0.83)	-0.002 7 (-1.12)	0.000 1 (0.03)	0.024 0 (1.13)
<i>gdpc</i>	-0.003 8 (-0.33)	0.000 4 (0.09)	0.008 0 (0.76)	0.013 4 (0.65)	0.027 9 (0.48)
<i>gdpg</i>	-0.007 2 (-0.14)	0.078 6 (1.02)	0.315 0** (2.35)	0.718 3*** (3.40)	1.472 4*** (6.23)
<i>dis</i>	0.000 8 (0.67)	-0.000 0 (-0.07)	-0.001 2 (-0.23)	-0.006 9*** (-0.75)	-0.014 6*** (-1.02)
<i>bund</i>	0.136 9 (0.54)	0.427 6* (1.80)	1.503 4*** (3.08)	2.487 2*** (3.80)	5.718 4*** (3.38)
<i>lan</i>	0.167 5 (1.01)	0.171 9 (0.08)	9.880 3 (1.15)	28.794 4** (1.85)	57.226 9*** (2.20)
<i>visit × gdpg</i>	0.005 1*** (5.21)	0.004 4* (2.88)	0.003 7 (0.94)	-0.006 5 (-1.31)	-0.020 6** (-2.27)
<i>cons</i>	0.053 1 (0.67)	0.010 7 (0.22)	-0.149 6 (-1.16)	-0.280 4 (-1.07)	-0.864 1 (-1.11)
R <sup>2</sup>	0.028 8	0.066 8	0.174 6	0.368 0	0.492 4
N	531	531	531	531	53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4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对比

变量	“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前			“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		
	25%	50%	75%	25%	50%	75%
<i>visit</i>	-0.000 9 (-0.14)	0.013 6 (0.88)	0.097 9* (1.55)	0.001 3 (0.08)	0.041 6** (2.16)	0.094 5*** (3.04)
<i>his</i>	-0.000 4 (-0.35)	0.000 8 (0.43)	0.001 6 (0.18)	-0.004 0 (-1.16)	-0.007 6* (-1.89)	-0.006 7 (-1.25)
<i>gdpc</i>	0.002 6 (0.26)	-0.000 1 (-0.00)	-0.000 2 (-0.00)	0.002 9 (0.11)	0.010 6 (0.27)	0.101 8 (1.21)
<i>gdpg</i>	0.044 6 (0.67)	0.214 4** (1.76)	0.662 0*** (3.00)	0.181 1 (1.28)	0.451 4** (2.37)	1.017 6*** (2.67)
<i>dis</i>	-0.000 1 (-0.03)	-0.000 9 (-0.15)	-0.005 9 (-0.44)	0.000 0 (0.01)	-0.002 2 (-0.40)	-0.007 2 (-1.02)
<i>bund</i>	0.385 6 (0.84)	1.865 1*** (2.91)	2.832 3** (2.05)	0.375 9 (0.91)	1.089 6* (1.83)	2.254 7** (2.34)
<i>lan</i>	0.289 4 (0.07)	10.461 8 (1.55)	12.273 3* (1.67)	0.059 2 (0.00)	26.374 5 (1.32)	57.492 4** (2.07)
<i>visit × gdpg</i>	0.004 6** (2.19)	0.000 7 (0.14)	-0.008 4 (-1.54)	0.003 4 (0.69)	0.003 2 (0.64)	-0.009 1 (-1.12)
<i>cons</i>	-0.021 4 (-0.20)	-0.084 3 (-0.57)	-0.223 9 (-0.55)	0.009 1 (0.03)	-0.115 1 (-0.26)	-1.188 3 (-1.15)
R <sup>2</sup>	0.101 9	0.207 9	0.379 4	0.057 5	0.192 0	0.409 7
N	236	236	236	295	295	29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接投资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因此,假设3成立,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

#### (四) 内生性问题的研究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不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而且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尝试着解决内生性问题。根据王根蓓等<sup>[30]</sup>的研究,两国之间的经济活动,如双边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显著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可以选择内部的工具变量,即将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滞后项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参照杨娇辉等<sup>[21]</sup>的研究,将解释变量滞后1期,实施25%~75%分位点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本文利用1年的滞后变量作为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工具变量,并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进行处理,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在极低分位点(10%)和极高分

表5 面板分位数回归滞后1期

变量	10%	25%	50%	75%	90%
<i>visit<sub>t-1</sub></i>	0.043 4 (1.48)	0.194 3** (2.33)	0.531 3*** (4.63)	0.616 4*** (4.27)	0.174 0 (0.73)
<i>his</i>	0.004 9 (0.35)	0.002 (0.23)	0.009 5 (0.74)	0.001 8 (0.028)	-0.043 2 (-0.39)
<i>gdp<sub>c</sub></i>	0.134 2 (1.62)	0.163** (2.03)	0.232 5** (2.04)	0.681 3** (2.14)	3.472 8** (2.16)
<i>gdp<sub>f</sub></i>	0.584 7** (2.41)	1.017 4*** (4.55)	1.186 3*** (2.75)	3.082 5*** (3.07)	6.817 1*** (3.33)
<i>dis</i>	-0.017 6 (-0.76)	-0.020 9 (-0.52)	-0.019 9 (-0.48)	-0.046 5** (-2.21)	-0.071 2 (-1.07)
<i>bund</i>	2.574 9** (2.34)	5.486 7*** (2.83)	13.373 5*** (4.1)	28.049 8*** (7.40)	34.930 2*** (4.08)
<i>lan</i>	0.448 2 (1.24)	0.043 7 (0.04)	95.222 8 (1.43)	186.188** (1.97)	406.311 5*** (4.21)
<i>cons</i>	-0.190 7* (-1.8)	-2.660 4** (-2.53)	-4.007 5*** (-3.04)	-7.825 2** (-2.41)	-26.079 8* (-1.87)
R <sup>2</sup>	0.069 5	0.132 5	0.229 1	0.423 8	0.556 7
N	472	472	472	472	472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位点(90%)上不显著,表明外交往来不频繁与外交往来很密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在中间分位点(25%、50%、75%)显著,且回归系数与显著程度随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综上,在考虑了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内生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两国外交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

#### 六、稳健性检验

关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一些研究认为,由于投资具有长期性、沉没成本高、不易轻易撤资等特征,因而使用OFDI存量数据进行测度。本文进一步采取OFDI的存量进行估计(篇幅所限,估计结果未列示)。回归结果与上文分析一致,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有正的影响,假设1成立,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得到加强,假设3成立。建交时间对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并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其他变量均与上文一致,通过稳健性检验。

####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选择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对59个国家2010—2018年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与中国OFDI区位之间的具体关系,研究发现,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不但对OFDI显著为正,而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假设1成立。因此,双边外交关系是导致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假设2不成立,建交历史对我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成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OFDI的影响不断增强。本文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政治偏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基于上述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企业如何利用国家外交关系的信号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发挥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积极作用,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企业要主动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不断加强的时代机遇,密切关注双边外交形势的新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外交关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因此,企业可以加强对国家外交形势的关注,与时俱进,借助“政策”的东风,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2)把握好双边外交关系的行业影响差异,促进企业进行有差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该积极利用国家之间的投资协定,寻找经济与外交组合的战略意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可以因地制宜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共商共建各类产业链。同时,积极利用政策的支持,将基建、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有效率地结合起来,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邻域、跨行业、多方位的对外直接投资。

#### 参考文献:

- [1]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130-140.
- [2]周朝鸿,张建红.“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中国优势的理论问题探索[J].对外经贸,2018(10):62-68.
- [3]刘晓光,杨连星.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J].金融研究,2016(12):17-31.
- [4]陈培如,冼国明,马骆茹.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17(2):50-61+136.
- [5]邓明.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 OFDI 的区位分布[J].国际贸易问题,2012(2):123-135.
- [6]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2):133-155+160.
- [7]蒋冠宏.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J].世界经济研究,2015(8):37-47+127-128.
- [8]杨连星,刘晓光,张杰.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6(11):56-72.
- [9]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12):126-142.
- [10]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9):21-40.
- [11]KONG Q, GUO R, WANG Y, et al. Home-country environment and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390-399.
- [12]PAPAGEORGIADIS N, MCDONALD F, WANG C,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how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ffect outward FDI loca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1):101620.
- [13]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经济研究,2012(5):71-82+146.
- [14]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165-176.
- [15]葛顺奇,罗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2013(6):28-42.
- [16]FUNG H, QIAO P, YAU J, et al. Leader narcissism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1):101632.
- [17]TANG R W. FDI expansion spee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capit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9(6):101596.
- [18]常玉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动态特征——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例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2):87-94+137.
- [19]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7):45-54.
- [20]王胜,田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13

(12) : 60-66 + 86.

- [21] 杨娇辉, 王伟, 谭娜.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 世界经济 2016(11) : 3-27.
- [22] 潘镇, 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财贸经济 2015(6) : 85-97.
- [23] 余泳泽, 潘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J]. 经济研究 2019(3) : 150-165.
- [24] 程惠芳, 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 2004(11) : 23-30.
- [25] 李阳, 臧新, 薛漫天. 经济资源、文化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4) : 148-157.
- [26] WANG Y, LARIMO J. Survival of full versus partial acquisition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host country context characteristic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1) : 101605.
- [27] CONTRACTOR F J, DANGOL R, NURUZZAMAN N, et al. How do country regulation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2) : 101640.
- [28] 张为付, 李逢春.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演进——FDI 决定理论研究新进展[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4) : 162-174.
- [29] 谢杰, 刘任余.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应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6) : 66-74.
- [30] 王根蓓, 赵晶, 王馨仪. 生产力异质性、市场化进程与在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基于 ML-Binary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2) : 127-137.

(责任编辑: 王顺善; 英文校对: 葛秋颖)

## Location Choice of 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Friendship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ZHANG Weifu, WU 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have been endowed with new content and missi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conomic activities has been deepened. The bilateral friendly diplomacy is a positive signal and has an impa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OFDI. With data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from 2010 to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on China's OFDI location choice and uses the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 of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ilateral friendly diplomatic activities ar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FDI.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is promotion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erefore, enterprises c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plomatic situation between countrie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obtain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bilateral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One Belt One Road”; location of choice